

宋金之间的交通路线与瓷器交流

刘 海 宇[※] 藪 敏 裕[※]

缘起

自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始¹⁾，至1234年在蒙宋联合围攻下金朝覆亡为止，金宋两朝并存一百余年。金国建立之前，北宋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制瓷业极为兴盛，曾大量出口瓷器至北方的辽国。辽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北宋陶瓷，包括邢窑和定窑的白瓷、越窑和耀州窑的青瓷以及南方的青白瓷，其中以青白瓷占大多数。²⁾ 与此不同的是，金境内出土的南宋陶瓷数量较少，学者统计考古发现的宋瓷仅在百件上下，包括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和建窑瓷器等，其中青白瓷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³⁾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其深层原因值得深思。

本文在概观金宋两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基础上，首先考察金宋之间人员、经济、文化的交流方式与路线，接着结合金宋境内出土对方瓷器的情况考察金宋瓷器交流的途径与路线，最后思考金境较少出土南宋瓷器现象产生的具体原因。

一、宋金关系概观

在宋金国际交往过程中，金朝大多处于主导地位，金对宋政策的变化对两国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学者根据金对宋政策的发展变化，将宋金关系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金天辅元年（1117）至天会三年（1125）为金宋联合灭辽的联盟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天会三年金发动攻宋战争至皇统元年（1141）“绍兴议和”为金与南宋的全面战争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皇统元年至贞祐五年（1217）为金宋和平相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兴定元年（1217）金宣宗攻宋至金朝灭亡（1234）为金宋关系破裂和蒙宋联合灭金时期。⁴⁾

第一个时期以1117年宋廷准备派使者赴金商议联合灭辽为标志，1118年8月宋使自登莱泛海赴金，1120年宋金缔结的盟约，约定联合攻辽，灭辽之后宋将原输辽“岁币”改输给金，史称“海上之盟”。1125年金灭辽之后，撕毁盟约发动灭北宋战争，这标志联盟时期的结束。在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基调是有好的“盟友”。

第二个时期始于1125年金太宗的攻宋战争，金灭北宋之后又积极进攻南宋，意图灭亡南宋，其后

※ 岩手大学平泉文学研究センター

1) 有学者认为《金史》所载金朝开国史是不真实的，例如：刘浦江指出完颜阿骨打1114年起兵之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国家，国号“女真”，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208-260页。

3) 李琳《宋、金的瓷器交流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袁胜文副教授，2013年，6页。

4) 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4-6页。

南宋实力逐渐回复，宋金军事实力转化为势均力敌。在这种形式下，金对宋政策由攻占转变为议和，绍兴十一年（1141）双方达成“绍兴和议”，约定宋向金称臣，划定疆界，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中游为界，宋向金每年纳“岁奉”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史·高宗本纪》）。这一时期是宋金矛盾激化的全面战争时期。

第三个时期以1141年“绍兴和议”为标志，至1217年金宣宗以南宋“不纳岁币”为由发动攻宋战争为止。这一时期中间虽有几次短时间的战争，但以和平相处为基调，是两国往来频繁、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自1217年金宣宗发动攻宋战争始，至1234年蒙古灭金为止。这是金宋关系破裂和宋蒙联合灭金的时期。

纵观金宋对峙一百余年的关系史，战争时期约占四分之一，和平相处时期占四分之三。和平时期，两国实行交聘制度，在正旦、皇帝生辰等重要节日双方互派使节，经济、文化方面也交流频繁。即使战争时期，双方也是不断尝试和平谈判，积极谋求和议的途径，亦不会完全中断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二、宋金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路线

宋金两国之间往来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上述各个时期随着宋金关系的变化，两国之间的交流方式和路线也有所不同。以下分四个时期分析宋金两国的交流方式和具体路线。

1. 第一时期

这是宋金两国“盟友”关系时期。在1122年金兵攻占辽西京（今大同）和燕京（今北京）之前，因有辽国的存在，宋金之间陆路交通线断绝，主要依靠海上交通。1122年岁末，阿骨打攻陷辽西京、燕京，金宋接壤，1123年初金交割辽西京、燕京与宋，宋向金交纳“西京兵赏”银二十万两和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并银绢等”⁵⁾，至1125年10月金兵攻宋之前近三年期间，金宋两国始有陆路交通。此时，宋输金的岁币等在金南京（今辽阳）交割（《会编》甲132页）。

这一时期前五年（1117-1122），宋金之间存有辽国，只能海路相通。1117年（政和七）7月辽国人高药师等为避难漂流至登州，8月宋廷派使者同高药师赴金，未能登岸而回。第二年8月4日，宋使持礼物再次出使，从登州乘平海军船出发，闰9月9日于金地苏州（今大连金州区）登岸，为金兵所获，陆行经十余州行三千余里，9月27日至金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当年12月2日，宋使偕同金使还至登州，陆行至宋都开封府。金使所持礼物有：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等（《会编》甲19-20页）。其后，宋金频繁互派使者商议联合灭辽事宜，最终达成“海上之盟”，所行均为上述路线。这条路线具体可分三段，会宁府至苏州（大连金州区）走陆路，苏州至登州走海路，登州至开封府走陆路（图一，①）。

这一时期后三年（1123-1125），两国接壤，始有陆路交通。灭辽之后，北宋接收燕京，输金“岁币”和燕京岁赋等搬运至金“南京（今辽阳）界首交割”（《会编》甲142页）。1124年，金太祖阿骨打死于回兵途中，其弟完颜晟即位，是为金太宗。1125年正月戊戌（26日），北宋派出“贺登位”使团，陆路赴金廷会宁府，至8月5日回到开封。《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载宋境内一千一百五十里，分二十二程，自契丹旧界白沟至金庭三千一百二十里，分为三十九程，详细记载宋境以外每程的起止和里程数（《会编》甲185-193页），所经州郡主要有雄州（今河北雄安）、涿州、燕山府（今北京）、通州、蓟州、滦州、营州、润州（今秦皇岛海阳）、迁州（今山海关）、锦州、昱州（今辽宁北镇）、沈州、咸州（今辽宁开原）、

5)〔宋〕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大化书局，1979年，甲 127-128页。以下简称《会编》。

信州（今辽宁四平）、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会宁府等（图一，②）。

2. 第二时期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大肆进攻北宋，至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师失守，金兵入城（《会编》乙120页）。靖康二年三月，金人立张宗昌为“大楚”皇帝，之后劫持宋徽宗、钦宗以及宗室回军。当年五月，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十二月，金人以宋高宗废黜张宗昌为借口，再次大举攻宋，一度渡过长江，迫使高宗入海逃避。建炎四年（1130）七月，金人又立刘豫为“大齐”皇帝，管理金人攻占的黄河以南地区。绍兴五年（1135）年正月，金太宗病逝，熙宗即位，随着南宋军民抵抗能力的加强，金人始有与南宋议和的打算。其后，金兵攻宋仍未停止，战事依然不断。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金人废黜刘豫伪齐政权。金宋两国经过绍兴九年（1138）和绍兴十一年（1141）的两次议和，最终于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达成“绍兴和议”，标志着全面战争时期的结束。

这一时期，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俘掠宋徽宗、钦宗北归，之后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期间金宋两国虽以战争为主调，但也有政权之间以议和为目的的使者派遣，使者所经路线既有海道，亦有陆路。例如：靖康元年（1126）十月二十八日，钦宗派遣黄鹄为使者，“由海道使金国，先次以礼物等往，因议和。”（《会编》乙17页）南宋建立后，建炎年间（1127-1130）高宗数次派出“祈请使”、“通问使”赴金。这些使者有的仅到金军元帅帐前，例如：“第二次、第三次奉使刘晦、杨可辅、王颙归自军前”（《会编》乙597页），有的则抵达金都上京会宁府，其中建炎二年宇文虚中出使金国而被金廷羁留，出仕金国多年。绍兴三年（1133）之后，南宋频繁派使者赴金，商谈议和事宜，金国亦数次遣使来聘（《会编》丙246-631页、丁1-178页），这些使者多循陆路以及运河水路（图一，③）。

南宋与刘豫伪齐之间有陆路交流。例如：建炎四年（1130）十月，刘豫在宿州建“归受馆”，以招降南宋军民，又置“榷场”，以通南北之货（《会编》丙188页）。绍兴元年（1131）十月，刘豫又在泗州设“招受司”，同年十二月南宋吕颐浩亦以“榷场”为便，奏请开通“京东、河北”商贾（《会编》丙246页）。南宋与刘豫伪齐之间亦有海路交通，例如，绍兴元年九月，伪齐的徐文聚众从山东半岛的灵山循海路归顺南宋朝廷，又于绍兴三年五月自明州（今宁波）泛海归附于刘豫（《会编》丙232、297页）（图一，④）。

3. 第三时期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绍兴和议”签订，约定宋向金称臣，两国边界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中流，宋向金每年纳“岁奉”银、绢25万两、匹，两国关系基本进入和平稳定时期。这一时期，较为大规模的战争一是发生于海陵王在位时期以及金世宗在位初期（1160-1164）的金攻宋之战，其后两国于兴隆二年（1164）十一月订立盟约，史称“兴隆和议”；二是开禧二年（1206）至嘉定元年（1208）南宋韩侂胄的北伐战争，最终宋军失利，两国签订“嘉定和议”。绍兴十一年之后，两国确立交聘制度，约定每年正旦、皇帝即位、生辰以及崩薨等时节，双方均要按时派遣使节。据研究，绍兴十一年至嘉定十年（1217）的近八十年间，南宋向金国派出使节二百余次，金国向南宋派出使节一百五十余次。⁶⁾金都最初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大兴府，贞祐二年（1214）宣宗迁都南京开封府。随着金都所在的不同，南宋使者的目的地和所行路线均会有所不同。

宋金交聘使者所行的驿道是两国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金迁都燕京之后的六十余年间，使者穿梭在燕京至临安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据研究，这条驿道既有内河航运的水路，也有陆路，具体可分三段：一是临安至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南宋境内的水路段，二是从金泗州（今江苏盱眙北）至金南京（北宋开

6) 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68-232页。



图一 宋金之间主要交通路线示意图（笔者制）

封府)的陆路段,三是从金南京至金中都燕京的陆路段⁷⁾(图一,③)。

两国互设榷场,展开互市贸易。《金史·食货志》载:“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金先后在寿州(今安徽凤台)、邓州(今河南邓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河)、颍州(今安徽阜阳)、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南)、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洮)等地设立榷场(《金史·食货志》)。绍兴十二年(1142)始,南宋先后在盱眙军(今江苏盱眙)、楚州(今江苏淮安)、淮阴(今江苏淮阴)、安丰军(今安徽寿县)、霍邱县(今安徽霍邱)、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光山)、天水军(今甘肃天水)等地设立榷场。⁸⁾这些榷场随着金宋两国关系的变化,时有罢废或复置,并不是必须常设的互市场所,而这些榷场所在的地点肯定是两国陆路或水路交往的连接地。

这一时期,宋金之间的内河水路交通基本畅通,金使者入南宋境内走水路赴临安⁹⁾。宋输金岁币亦多走内河水路,嘉定九年(1216)南宋真德秀曾建议以“漕渠干涸”为由停止向金输纳岁币¹⁰⁾。两国之间的海路交通也具有一定规模,南宋在沿海设置“统制官”,专门管理两浙路海道(《宋史·孝宗本纪》)。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在陈家岛(今山东青岛附近)进行大规模海战,宋水军烧夺金水军战船六百余艘,俘虏三千余人(《宋会要辑稿·兵捷》)。南宋水军的规模远胜北宋,在与金军作战中所

7) 张锦鹏《南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40页。

60-61页。

8) 参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205-208页。

10) [宋]佚名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

9) 李辉《宋金交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81页。

取得的战果远胜于南宋陆军。宋孝宗以降，南宋在沿江、沿海设置三十支水军，其中沿海十五州有水军。

¹¹⁾《宋史·孝宗本纪》载，乾道三年（1167）八月“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军制置使，自盐官至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军悉隶之。”

4. 第四时期

这一时期，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先是金宣宗在兴定元年（1217）四月以南宋不纳岁币为由发起攻宋战争，接着在金哀宗时期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最终于端平元年（1234）正月攻灭金国。这期间，宋停止输纳岁币，拒绝金国使者入境，基本断绝了两国之间的正式往来。

三、宋金之间的瓷器交流

文献所载金宋交聘使者所持礼物以及榷场互市贸易货物中，均几乎见不到有关陶瓷器的记载。史料所见金宋交往中，可见有关茶的记载，例如：北宋宣和末年，宋使赴金所持礼物中有“芽茶三斤”（《会编》甲182页），南宋绍兴和议之后，南宋赴金的贺生辰、正旦使所持礼物中有“金茶器千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戎礼物》），但是却难以见到陶瓷茶器的记载。这或许与宋金上层社会所使用金银质的食器和茶器有关，例如：日本入宋僧人成寻《参天台山五台山记》记载熙宁五年（1072）时所见北宋上层社会或身份较高的僧侣多用银质食器和银质茶器¹²⁾，金人占领开封之后多次发布彻底收刮金银的“根括金银”令（《会编》乙163、245页）。金宋之间陶瓷器的交流，学者大多只能根据考古发现的出土器物进行研究。

1. 金境出土宋瓷情况概观

金之前的辽代时期，辽曾大量输入北宋陶瓷，辽境出土的宋瓷涵盖邢窑、定窑、耀州窑、越窑、景德镇窑等诸多窑系，学者总结其输入方式主要有掠夺、贡奉以及贸易等。¹³⁾与此不同的是，金代内陆地区出土的南宋陶瓷并不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00件上下，以青白瓷为最多，约占70%，其次是龙泉窑，约占28%，建窑最少，仅占2%。出土地点分布较广，约占金境的一半。金代初期，金境内陆地区出土宋瓷仅见青白瓷，至金中后期，所见宋瓷种类和出土地点均有所增多。¹⁴⁾

不过，近年金境内的海运港口出土了不少南宋陶瓷器，例如：河北黄骅海丰镇港口遗址出土一些龙泉窑系的青瓷与景德镇窑的青白瓷¹⁵⁾，山东垦利海北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景德镇窑系的青白瓷以及少量的建窑瓷器¹⁶⁾，山东胶州板桥镇遗址出土了不少南宋时期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以及福建窑系的陶瓷器¹⁷⁾，连云港（金代海州）亦发现了一些包括南宋龙泉窑在内的南方陶瓷器¹⁸⁾。这些金代港口遗址的发现可以弥补金境内陆地区较少发现南宋陶瓷器的不足，但总体来说，金境内出土南宋陶瓷器的总体数量并不多。

关于金境出土南宋陶瓷数量较少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与女真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金人传统食器只用木器而不用陶瓷，宋代文献记载金人“食器无瓠陶，无碗筋，皆以木为盘”（《会编》甲23页）。可见，在金代早期金人贵族尚没有使用瓷器的习惯。二与金代的瓷器生产有关。金人占领黄河流域之后，

11) 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中华书局，2011年，212-224页。

12) (日)释成寻原著；白话文、李鼎霞点校《参天台五台山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14、36-38、117、130-131、228页。

13)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208-260页。

14) 李琳《宋、金的瓷器交流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6-31页。

15) 黄骅市博物馆等《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289-293页。

16) 徐波、柴丽萍《山东垦利县海北遗址新发现》，《华夏考古》2016年第1期，38-44页。

17)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17-149页；徐波、德留大辅《山东地域中国南方産陶磁器の流通に関する研究(その2)》，《貿易陶磁器と東アジアの物流—平泉・博多・中国》，高志書院，2019年，147-160页。

18) 刘洪石《唐宋时期的海州与海上“陶瓷之路”》，《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201-205页。

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传统磁窑迅速恢复生产¹⁹⁾，考古发现证明金代前期（北宋灭亡至海陵王迁都燕京）定窑所烧细白瓷的产量巨大²⁰⁾，金代中后期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的产品在河北黄骅海丰镇港口遗址均多有发现²¹⁾。如果产量能够满足自己的使用需要，大可不必从南宋输入笨重的陶瓷器。三与南宋瓷器的质量有关，北方传统磁窑产品质量较高，而南宋瓷器烧制技术多承自北方，金人在本国可以生产高质量瓷器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从南方大量输入。

随着金人统治区域的扩大以及中原文化影响的加强，金人贵族逐渐有了饮茶的习惯。上引文献记载北宋宣和年间使节赠金礼物中有高等级的“芽茶三斤”以及“绍兴议和”后南宋使节贺生辰和正旦时贡奉“金茶器千两”。《大金吊伐录》载靖康元年（1126）宋人礼物中有“兴国茶场拣芽小龙团一大角、建州婺源夸茶三十夸”以及“上等拣芽小龙团一十斤、小团一十斤、大团三十斤”等，金大定九年（1161）南宋贡奉的礼物中有“腊茶三千胯”（《金史·高德基列传》）。金中期以后，金人饮茶盛行，所需之茶“自宋人岁贡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以至于泰和六年（1206）金章宗以购茶花费巨大为由颁布禁茶令，规定七品以上官员家庭才可食茶，并不得买卖和馈赠（《金史·食货志》）。金人饮茶的盛行必然导致瓷器使用的增加，虽然金境瓷器生产较为兴盛，但适用于煎茶的南宋精美瓷器亦会有市场需要。另外，金人占领地区的北方汉人一直有使用瓷器的习惯，所以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北方主要窑口的生产恢复很快。

2. 宋境出土金瓷情况

据迄今所见考古报告等资料，可知南宋境内出土金代瓷器数量较多。例如：杭州南宋太庙遗址曾出土磁州窑瓷器，临安府治遗址曾出土耀州窑瓷器，南宋墓葬出土定窑瓷器。²²⁾南宋御街遗址出土不少定窑和磁州窑瓷器。²³⁾宁宗杨皇后宅遗址出土定窑、磁州窑和汝窑所产的瓷器。²⁴⁾临安都亭驿遗址亦出土不少精美的定窑瓷器。²⁵⁾扬州出土少量金代磁州窑白底黑花瓷器。²⁶⁾四川地区南宋时期窖藏亦可见定窑、磁州窑的瓷器。²⁷⁾从时代看，上述宋金关系第二时期所出北方窑口瓷器的数量较少，第三时期最多；从地区看，长江下游和四川地区的出土量最为密集。从窑口看，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汝窑等窑系的瓷器均有出土；从数量看，定窑瓷器出土量最多，其次是耀州窑系瓷器，而磁州窑系、钧窑、汝窑的瓷器则较少。²⁸⁾

南宋虽然可以生产高质量的陶瓷，但其境内还是出土了较多的金代陶瓷。究其原因，这应与南渡宋人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有关。黄义军先生曾指出：“消费者对不同釉色品种的选择，除开经济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考量。反映了不同的人群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²⁹⁾李琳先生指出南渡宋人“对北方物产怀有的特殊情结，为金代瓷器的南销提供了市场需求。”³⁰⁾这些观点都是很有道理的。

3. 宋金瓷器交流的方式与路线

(1) 金境输入宋瓷的方式与路线

19) 《金史·地理志》载真定府“产瓷器”。《大金集礼·卷第九·公主》载“天眷二年（1139），奏定公主礼物……定磁一千事”，可知在“绍兴和议”之前定窑已经能够大规模烧制上等瓷器，以供皇室使用。

20) 秦大树等《定窑洞磁岭窑区发展阶段初探》，《考古》2014年第3期，82-97页。

21) 黄骅市博物馆等《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289-293页。

22) 马时雍《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196页、202页、249页。

23)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御街遗址》，文物出版社，2013年，26页、63页、115-124页。

24)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文物出版社，2008年，34-46页。

25) 邓禾颖《南宋早期宫廷用瓷及相关问题探析》，《东方博物》第42辑，2012年，16-24页。

26) 徐仁雨、周学山《扬州出土宋金元磁州窑系白地黑花器研究》，中国古陶瓷学汇编《宋元窑业技术交流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94-103页。

27) 陈杨《四川地区宋元瓷器窖藏综述》，《文物春秋》2011年第5期，17-24页。

28) 李琳《宋、金的瓷器交流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32-56页；刘淼《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初步探讨》，《考古》2008年第9期，59-73页。

29) 黄义军《古陶瓷研究中的地理学视角》，《东南文化》2007年第4期，70页。

30) 李琳《宋、金的瓷器交流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4页。

金人输入南宋陶瓷的方式应主要有掠夺、贡奉以及贸易等方式，掠夺主要发生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第二个时期金灭北宋期间，金人大肆掠夺人口、财富、典籍等（《会编》乙160-245），史籍虽没有关于金人掠夺瓷器的记载，想必北宋府库的精细瓷器也在掠夺之列³¹⁾。例如：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建筑工地出土一批烧制于北宋中期黄堡镇耀州窑的高等级贡瓷，学者认为当是金人攻陷汴京时所掠夺的战利品。³²⁾同时宋人在向金廷贡奉名茶的同时，亦会贡奉茶器，除上文所及的“金茶器”之外，也会有精美的瓷茶器。但因瓷器易碎而且较为笨重，掠夺和贡奉不会是金人获得南方瓷器的主要途径，而贸易才应是南宋陶瓷输入北方的主要方式。

山东胶州板桥镇港口遗址出土了金“天会八年（1130）”年的铭文砖³³⁾，说明即使在战争时期，港口的建设和海上贸易也没有完全停止。安徽淮北柳孜大运河河道遗址晚期地层中出土相当数量的金代定窑瓷器，其中金代中晚期的印花盘数量最多，³⁴⁾该遗址也出土一些南宋景德镇湖田窑等窑口的瓷器，发掘者推断运河柳孜段废弃于金代晚期，³⁵⁾由此可知宋金时期北方窑系瓷器以及南方窑系瓷器确实经内陆水运相互贸易。

贸易包括内陆的榷场互市贸易以及海运贸易，前者又包括陆路交通线的榷场贸易和泗州等内陆水运方式的榷场贸易，后者又包括经过设置于胶州板桥镇的榷场互市贸易和海上走私贸易。因瓷器不适合长距离的陆路运输，所以内陆水运榷场互市贸易和海运贸易应是南方瓷器流入金境的主要途径（图一，③、④）。

（2）宋境输入金瓷的方式与路线

南宋输入金瓷的方式应有馈赠、掠夺和贸易等方式，其中前两种方式的数量不会多，而应以贸易为最主要的输入方式。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九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权臣张俊贡奉给高宗一批汝窑瓷器。³⁶⁾虽具体不明张俊是如何得到这批汝瓷的，推测不外金人馈赠或贸易所得。汝窑位于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距离金宋边境不远，通过榷场互市贸易购买所得的可能性较大。如前文所述，宋境出土金代瓷器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和四川地区，长江下游的北方瓷器南下的榷场互市贸易路线包括以泗州为中心的内河水运路线（图一，③），以及以胶州板桥镇为中心的海上贸易路线（图一，④）。除官方互市贸易之外，当然也不能排除存在瓷器的内陆或海上的走私贸易。四川地区出土的金瓷沿川陕交通干线分布，学者推测应是“从关中平原通过榷场贸易或走私的方式进入宋境”，然后经陆路或内河水路到达消费地点³⁷⁾。

如上所述，金境港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北方窑口瓷器，这些瓷器无疑都是用于外销的。其外销的目的地，最主要的应是南宋，其次是朝鲜半岛等。特别是河北黄骅海丰镇港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定窑系和磁州窑系瓷器，学者已经指出这些瓷器的销路一是海外贸易，二是与山东垦利海北港口和胶州板桥镇港口组成海运体系向南运输瓷器等进入宋境，当然也包括向金境内的北方转运³⁸⁾（图一，①、④）。通过考古发现得出的这一结论非常具有说服力。

31) 北宋皇宫设有“瓷器库”，熙宁三年并入杂物库（《宋会要辑稿·职官·天府库》）。

32)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254-255页。

33)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162页。

34) 解华顶《淮北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金代定窑印花盘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9期，23-27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2002年，24-67页。

3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淮北濉溪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2期，21-33页。

36) 熊廖《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20页。

37) 李琳《宋、金的瓷器交流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7页。

38) 吴敬、石玉兵、潘晓曦《金代瓷器海运港口的考古学考察》，《考古》2018年第10期，110-120页。

余论

本文依据宋金关系的分期，探讨了每个时期宋金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路线，结合金境考古发现南宋瓷器以及宋境出土金代瓷器的情况，考察了宋金之间瓷器交流的方式与路线。与辽代大量输入北宋瓷器相比，金境内出土南宋瓷器较少，我们推测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一与女真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关，二与金人上层社会多使用金银质食器和茶器有关，三与金代的瓷器生产有关，四与南宋瓷器的质量有关。而南宋境内出土金代瓷器较多，其原因与南渡宋人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有关。宋金之间的瓷器交流最主要的方式是贸易，包括内陆的榷场互市贸易和海运贸易，前者又包括陆路交通线的榷场贸易和泗州等内陆水运方式的榷场贸易，后者又包括经过设置于胶州板桥镇的榷场互市贸易和海上走私贸易。因瓷器不适合长距离的陆路运输，所以内陆水运榷场互市贸易和海运贸易应是宋金之间瓷器交流的主要途径。

附记：本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基盘研究（B）“11～14世紀の日本に流通する中国産陶磁器の産地推定と流通に関する比較研究”（20H21320）的阶段性成果。